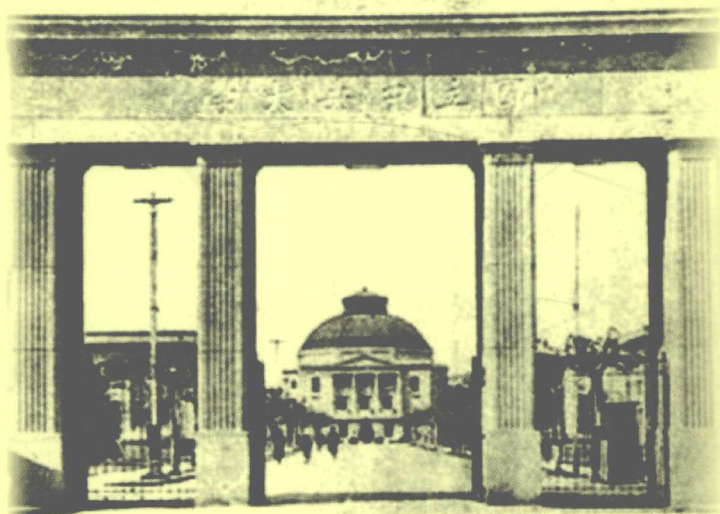


NANJING EDUCATION HISTORY

南京教育史

第2版

徐传德 主编



商務印書館

NANJING JIAOYUSHI

南京教育史

第2版

徐传德 / 主编

商务印书馆

2012·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教育史/徐传德主编. —2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ISBN 978-7-100-09002-5

I. ①南… II. ①徐… III. ①教育史-南京市 IV. ①G527.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005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NÁNJĪNG JIÀOYÙSHĪ

南京教育史

(第2版)

徐传德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002-5

2012年8月第2版

开本 635×965 1/16

2012年8月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59

插页 2

定价: 120.00 元

南京教育史

啓功題



《南京教育史》

(第2版)

编纂委员会

主 任	徐传德						
委 员	吴晓茅	周文海	洪 伟	陈舒泛	张 生	夏 莹	
	潘东标	张利明	孙建新	王云霞	任晓明	黄 辉	
	杨林国						

编 纂 人 员

主 编	徐传德						
副主编	周新国	周文海	张 生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永和	沈曙虹	徐步伟	徐承德	虞朝东		
编纂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慧超	王能龙	孙显军	华国梁	刘永和	许卫平	
	朱季康	朱小琥	陈景春	谷 力	沈曙虹	汪大年	
	张 生	张连生	张学文	张继格	金鱼为	罗 瑛	
	周新国	姚 慧	钟小燕	徐承德	章 宏	谢洁菱	
	谢颂和	虞朝东等					

审 订 专 家

汤世雄	宋恩荣	郭福昌	赵宝琪	王炳照	熊贤君
(以下以姓氏笔划为序)					
万克德	马征里	邓洪波	王 悦	冯荣光	孙文松
安永新	毕 诚	刘 茗	刘良业	陈乃林	宋良文
张 驰	张 彬	张凤民	杨进发	杨秀华	周慧梅
赵关忠	高小方	徐智德	符康荣	储朝晖	魏天纬
魏所康					

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

(代序)

徐传德

—

如果你从事教育工作,那就必须了解一点教育的历史;如果你想了解中国教育的历史,那你一定不能忽略南京。

南京是这样一座城市:35万年前有了“南京猿人”的足迹,2500年前开始筑石建城,638年前成为全国的首都,100多年前成为“洋务运动”的重镇,57年前成为“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胜利前沿。今天的南京,古都风貌与江滨特色、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山水城林与和谐人文有机融合,正在朝着“长江国际航运物流中心、长江三角洲先进制造业中心、全省现代服务业中心、全国重要科教中心和东部城市绿化中心”的目标迈进。岁月峥嵘,从六朝兴废,到洪武纪元,到天京问鼎,到民国春秋,到侵略者蹂躏下的不屈抗争,从百万雄师过大江,到大桥飞架南北,到长江二桥、三桥、奥体中心雄姿英发,哪一种历史大气象南京不曾拥有,哪一种沧桑巨变南京不曾经历?

南京的教育又是怎样的情形呢?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期的南京已经有了学校教育;三国时期的南京已经成为江南教育中心、官学重地;宋元以来夫子庙、江南贡院等教育场所就闻名全国,至今仍有遗存;明清两朝,南京的江南贡院成为全国最大的科举考场,吴承恩、唐伯虎、郑板

桥、吴敬梓、翁同龢、张謇等都在这里考取功名而后独步天下;20世纪初,南京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重要发源地,经过民国时期的进一步发展,逐步成为堪与北京比肩的教育中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南京教育在曲折中前进,取得令人瞩目之成就,直至今日繁荣兴旺,基本建立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成为享誉全国并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之都。古往今来,南京办太学、兴私学,建书院、设贡院,从科考盛极一时,到清代派遣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从洋务运动后新式教育的迅速崛起,到“五四”时期教育思想的空前活跃,从20世纪50年代的“红专”之争,到真理标准大讨论,到今天的素质教育可圈可点、蔚为大观,南京教育当仁不让,引领风尚。鲁迅、巴金、胡风等泰斗以及一大批院士、名流,走出南京的新式学堂,走上世界的舞台中央;还有陶行知、陈鹤琴、吴贻芳、匡亚明、斯霞等,成为立足南京、影响全国、流芳久远的教育翘楚。“天下文枢”、“东南第一学”,南京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然而,南京却缺少一部像样的“教育史”。这委实有些令人遗憾。

二

编写一部《南京教育史》的想法,在我心中已存了一段时间。前几年在做“千年回眸”、“世纪回望”时,我不由惊叹于南京教育的丰富和博大,提出了“学在南京”的主张。2005年,曾经在南京工作过的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同志提出,要把南京建设成为像美国波士顿那样的“学习的城市”、“教育的城市”。此后,南京市委市政府经过调研论证,确立了把南京建成“全国教育名城”的目标。南京市委罗志军书记还特别指出,“教育名城”的主要内涵就是“历史积淀深厚,质量水平一流,名校名师众多,风格特色鲜明”。在这样的形势和机遇下,编写《南京教育史》的使命感令我满怀激动。

于是,数年酝酿,一载攻坚,几易其稿,这部包含了众多教育史专家与文字工作者心血的《南京教育史》终于能够与读者见面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我作为编修这部《南京教育史》的倡导者和直接参与者,心中的欢喜和快慰自不待言。

编修《教育史》有什么用?教育历史与现代教育究竟有什么关系?一些人的疑惑也正是我常常对自己的追问。

直接地说,“述往”是为了“思来”。经世致用,启发来者,垂训后人,是编写这部《南京教育史》的基本宗旨。修史未必要“成一家之言”,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却是一个应当努力达到的目标。纵观千百年来的教育活动,诸多成败得失,必有因果关联,其中的一些共同规律或原则,则是南京教育后继者宝贵的参考。现实总是对历史的承续。今天南京教育诸方面的繁荣,无一不是由过去积累和演变而来的,甚至我们教育工作者本身的许多思想、情怀、习惯,也是教育历史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能了解南京教育的过去,就不能透彻了解它的现在,也就不能很好地促进它在未来的发展;如果我们认识了南京教育历史演进的程序,则多少可以洞察它未来的趋向。

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不是史学之普遍规律,不敢断言。但这的确是我们审视历史时可以借鉴的一种态度。我们一方面要努力通达历史的客观形态,一方面也要敢于用今天的知识和价值来诠释和丰富历史。我们编写《南京教育史》,绝不是历史材料的简单堆积或机械复写,而是融入了现代的教育理念,通过现实视角的观照,力图“唤醒”南京教育历史的价值,以期引起读者对现实的思索,激发读者对未来的兴趣。换言之,无论是编写还是阅读使用《南京教育史》,只有和当下的教育世界、教育事件,和南京的教育工作者的精神生活融贯一气,它的价值才可以说是获得了展现。记载过去,启迪现在,昭示未来,这是《南京教育史》的基本追求。

其实,英国哲人培根早就说过“读史使人明智”的话。撇开经世致用的意图,历史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譬如面对一件远古青铜器,你所看到的绝不仅限于金属成色、冶炼技术等,你还会感受到某种时代精神的脉动,感受到某种穿越时空的艺术灵感,正激荡着你的想象和创思,激励着你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作为;而就在你的想象、创思和作为中,这件青铜器就获得了现时的生命。同样,面对南京教育的历史,我们应该以虔诚的姿态与之对话。只要用心,我们在对话的过程中就能够获得某种理性的感悟,从而使自己的认识和实践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现代人生存和

发展不可缺少的内容;教育历史也是现代教育工作者树立正确教育观、人生观的重要参照。开卷有益。相信这部《南京教育史》能够缩短现代教育工作者与教育历史的距离,为现代教育工作者丰富教育体验、开启人生睿智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

南京教育史虽然丰富而深邃,但其经络却也颇为分明。粗略说来,南京建城以来绵长的教育历史,从教育思想的嬗变看,我认为可以大致划分为五段。

一是“建业定都”以来以“政治教化”为正统要求的古代教育。中华民族有兴学重教的深厚传统,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既表明了古代教育极高的地位,也揭示了这种地位和政治及道德的密切关系。南京作为中国的“六朝古都”、“十朝都城”,自古就有尊重人才、重师重教的文化氛围,产生过比较丰富的教育活动,在农耕、军事、法律、算学、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相应的教育实践。不过从正统的要求来看,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为社会政治秩序服务。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在定都南京后提出: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这与“君民”、“化民”的要旨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在这样的目的追求下,古代教育经过漫长的积淀,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教育价值取向,例如重道德而轻实利、重政务而轻经济、重整体而轻个体、重和谐而轻竞争、重“天理”而轻“人欲”、重人文而轻科学、重价值探讨而轻本体追问、重科考功名而轻生产劳动等等。这当中的一些价值观具有超稳定的文化力量,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变革或转型后,似乎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存留了下来,不易察觉地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教育生活。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先秦时就诞生了“有教无类”的伟大思想,虽然中国和其他世界文明古国一样,其传统教育有极强的阶级性,但却不完全为贵族所垄断。以南京为例,从早先东晋时的私家办学到后来明清时的科考繁荣,都为底层贫寒之士的上升敞开了一条重要的通道。当然,这种“上升”在根本上还是为治国固邦服务的。

二是“洋务运动”以来以“中体西用”为进步潮流的近代教育。以

洋务运动为肇始,中国教育进入了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东方与西方、人文与科学、专制与民主等方面的矛盾与碰撞异常激烈,而在固守传统与全盘西化这两种极端的取向之间,“中体西用”这样一种理念整合由于具有较大的伸缩空间和回旋余地,逐渐成为当时教育思想的主流,这在当时是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的。在“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观念的引领下,南京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形式等方面都有了重要的突破。在“废科举、兴学堂”的历史潮流中,南京得风气之先,有过改良私塾等进步运动;书院讲学风貌也为之一变,采西学、制洋器、图富强,成为一些书院的办学宗旨;这时期魏源、龚自珍、冯桂芬都曾在南京教育界活跃过。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教会办学开始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培养了很多新式知识分子,客观上推动了教育的进步,今天的金陵中学、中华中学、人民中学、石鼓路小学等,也都在那时诞生。洋务教育兴起后,南京又有派员留学、创办洋务军事工业技术学校和新式军事学堂等积极举措。至20世纪初,南京又兴起改革书院、创办新式学堂的热潮,当时的各类学堂已初显现代教育从初等到高等并包括社会、成人教育的体系雏形。可以说,在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南京教育始终走在变革的前面。

三是“五四运动”以来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教育。五四以来,南京教育在动荡中前行。这时期,进步的教育理念应运而生,例如,与科学、民主的现代文明价值观相呼应,教育的全民性和民主性得到了推重;受西方杜威等思想家的影响,教育本身的价值、教育对个体幸福的关注和对个性的尊重等得到了肯定,学校与社会、教育与职业、书本与实践的联系也得到了加强。此时的南京,可称教育学术重镇,诞生了我国教育史上举足轻重的现代教育理论,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等等。作为南京教育史上最为重要的教育家,陶行知继承发扬了孔子那样的平民教育精神,“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同时又吸收了西方进步的教育思想,改造了杜威的教育理论,创建了“生活教育”这一新式教育体系。他的学术和事业成就是传统精神与西方思想碰撞交融的范例,他的人格是当时南京乃至全国整整一代教育工作者良知的生动写

照。

四是新中国建立后以“学习苏联”为主要方向的当代教育。1949年12月,新中国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教育”,并提出“借助苏联经验”。之后不久,随着“社会主义教育”取代“新民主主义教育”,对苏联教育的借鉴力度也进一步加大。这时期的南京教育也就充分体现出正规化、知识化、革命化的特点。由于教育领导权掌握在人民手中,党委政府对教育工作高度重视,新中国前十七年的南京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人民群众尤其是原底层群众受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加,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这时期的教育思想正式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原则,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教育研究的科学方法,分析教育现象、解释教育规律、指导教育实践,这是当时教育理论的重要进展。但当时的南京教育理论界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批判西方教育思想和传统教育思想(如对杜威、陶行知、陈鹤琴的批判)是武断和偏颇的。再者,对苏联著名教育理论家凯洛夫的《教育学》,当时也缺少必要的改造。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在国家行政领导和学校的关系上,忽视学校的自主性;在学校和教师的关系上,忽视教师的自主性;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忽视学生的自主性,这些负面影响,至今仍残留在教育文化的深处。但总的来说,这十七年的南京教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开创了良好的局面,但随后发生的“文革”,中断了这种局面的进一步发展。

五是改革开放以来以构建“特色体系”为追求的新时期教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京和全国一样,教育走向复苏和觉醒。各级各类教育迅速恢复或重建,百废俱兴。南京在全国较早普及义务教育和探索素质教育,较早启动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改革、教育教学改革、教育人事制度改革等。进入21世纪后,全市教育事业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快最好的发展,基本普及十二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也迈过了普及化的门槛,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今后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建立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在南京已经初步形成。从教育思想的深层结构看,这时期的南京教育已经不仅仅是追求对建国初十七年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也不仅仅是对某种外来教育范式的模仿,而是博采众长,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主旨,自我主导,自主创新,

致力于构建有中国特色(以及南京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在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实施素质教育、努力吸收国外先进理论为我所用、重新发现传统教育生命力和价值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绩。可以说,南京从此进入了一个“教育自觉”的时代。

四

在上述的一个基本的脉络框架内,我们可以进一步梳理出对当前和今后教育发展有深刻启示的要义和规律来,在这里不妨作一些初步的列举和描述,以期对读者有所启发。

一是教育的功能定位。“为了什么”,这是教育的基本问题。一部南京教育史,引导着我们从社会和谐与个体幸福两个方向来思考教育的终极目的。传统教育的主流是社会本位,主张“克己复礼”;但晚近又有了“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一说,教育中的人本身的价值开始觉醒和彰显。审视整部教育史,我们能够清醒认识到,对两种取向执其任一端的教育,都是窄化的教育、缺失的教育,我们应该致力于寻求两者的有机结合,促进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南京积极推行素质教育,追求和探索的正是民族振兴和个体幸福的高度统一。“教育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教育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根本定位。

二是教育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纵观南京教育史,千百年的自我积淀,百余年的学习效仿以及近几十年的自我构建,这当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今天南京自主构建的现代教育体系,必须在固有文化和世界潮流面前寻求一个适合的切入点。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教育传统是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文化根基。一味否定传统必然导致教育走向虚无,而一味固守传统又必然导致教育的僵化和衰微。例如,南京历朝书院重个体探究的学习方式,至今看来仍是先进的,值得深入开掘和继承;但若追慕南京在明清两代的科考繁荣而大兴“应试教育”,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荒唐想法;“文革”十年南京教育的巨大倒退则是“全盘否定传统”的惨痛教训。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抚今追昔,可以设

想,若没有近现代“采习西学”、“中体西用”等关键几步,南京教育的境界又怎会有今天这样的阔大?若没有新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合理借鉴和吸收“建构主义”、“多元智能”、“小班化教育”、“研究性学习”等理念和模式,又怎会有当前素质教育的丰富实践?但在对待民族传统和国外的教育思想上,我们应该认真甄别,充分论证其是否契合历史发展的走向,是否适合南京的文化土壤,切忌“食洋不化”和“食古不化”。

三是教育发展的机遇意识。一个社会提供给教育发展的资源往往有限,影响教育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也是变动不居的,机遇总是稍纵即逝。教育不能坐等社会支持,而要主动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而争取的结果如何,则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对历史机遇的把握程度。南京教育发展史上的若干个高点,莫不是在一次次看准时机、抢抓机遇、主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例如南京历朝书院随政治动荡几度兴衰,每次兴起都是因为有识之士看准了历史趋势,把握社会需要,不畏风险,虽折不挠;正是因为这种关键时刻的见识和勇力,书院文化才成为南京教育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至于说洋务运动以来南京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和培养目标的不同程度革新以及五四以来南京教育学术的繁盛,更是体现了几代教育有识之士审时度势的智慧和敢为人先的勇气。回顾这些赢得重大突破的事件,我们发现在每一次教育事业从量变到质变、积聚到腾飞之间,都存在着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不妨称之为教育发展的“节点”。由于教育内、外部条件的高度耦合,在这个节点上付出的主观努力会得到巨大回报;而这种耦合的瞬时性和不可重复性,则体现为在“节点”以外的任何主观努力都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可以说,抓住“节点”,“节点”就是起点,迎来的就是教育发展的黄金期;错过“节点”,“节点”成了盲点,换来的就是教育发展的停滞期。古人说,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揭示的也是这个道理。回顾近年来南京教育的发展,正是抓住了师范生就业形势变化的“节点”,才及早推出了“凡进必考”制度;正是抓住了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节点”,才迅速实现了三所名校的放大;正是抓住了省市教育工作会议的“节点”,才使免费义务教育的目标得以提前实现。当前,南京教育工作者肩负创建“全国教育名城”的重要使命,更需要把准“节点”、抢抓机遇的洞见和谋略,需要赶超时代潮流敢于在风口浪尖拼搏

的勇气和智慧。

四是兴办教育的两支重要力量。关于南京教育史上的教育机构,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例如“国学”、“官学”、“国子监”、“私学”、“书院”、“私塾”等。不难发现,它们实际上代表着两支重要的办学力量,一是朝廷(官府)的力量,一是民间的力量。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城,官学繁荣自在情理之中;但官学的繁荣并没有挤压民间办学的空间,而且事实上在古代的大部分时间,民间办学一直是南京教育不可忽视的力量,并形成了比官学更为鲜明的特色。可以说,倡导办学主体的多元化,鼓励民办教育,并不始于今日,而是有着悠久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教育体制改革以来,南京民办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市民不可或缺的教育资源,这既是对改革开放的呼应,也是对南京民间兴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五是教育探索的多样化。封建朝廷对通过教育实现稳固统治的高度重视,并没有造成官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客观上是社会需要使然。对社会需要的顺应,同样也促成了五四以后南京教育思想的空前繁荣。陶行知的农村教育实验、黄炎培的农村职业教育研究、陈鹤琴的幼儿教育研究,虽然各行其道,各成一家,但都是紧紧地把握了社会发展需要。陶行知说过,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我们今天的教育明确承担着“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艰巨任务,也必须走多样化的教育发展之路,必须在教育途径、载体、手段、方式、方法上实现多元、多样、灵活、开放,从而满足社会多样化的人才要求,家庭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学生多样化的人生追求。

五

不了解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不了解教育历史的教育者永远不会成为成熟的教育者。当一个人在面对“我是谁”、“从哪里来”、“向何处去”这样的根本性追问感到困惑与茫然时,他总是把目光投向历史来寻求某种启示,从而发现生命的根基在哪里,奋斗的目标在哪里;同样,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市的教育,也总是在历史中认识自己的独特价

值,认识本身的规律和目的;从而也获得对现实的深刻洞见,获得对未来的使命和信心。

因此,在历史面前我们感到敬畏也感到自信,我们充满激情也充满理性;我们真切感受到千百年、亿万人的智慧和心血,真切感受到我们担当的责任和肩负的使命;我们对教育的热爱变得更加纯洁和坚定,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变得更加广阔和澄明。

当下,南京教育史已翻开崭新的一页。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我们继承了前人的事业,也面对着前人所没有经历过的新难题:在素质教育的框架下该如何应对考试升学?在教育大众化的条件下该如何培养精英人才?在教育均衡化要求下该如何建设名校?在统一性的教育目标下该如何实现多样化的发展?如何把握教育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如何把握教育的公益性追求和市场化取向的关系?如何解决教育需求与教育投入的矛盾?如何解决学校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的矛盾?如何在公众的高度关注下开展工作?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受教育需求和不断上升的成才渴望?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我们在继承历史,也在创造历史。我们有责任有信心在实践中破解难题,在破解难题中推动教育历史的进步。

置身浩瀚历史,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立足教育岗位,我们深感责任之压力,深感使命之激励。于是,一种书写新历史的渴望在心中益发强烈。

我们身逢盛世,有理由创造出更为辉煌的未来。

2006年10月

第2版序

徐传德

所谓历史,通常有两种写法,一种用笔,一种用实践。用笔写,是记录历史;用实践写,是创造历史。能够进行“双重书写”的人,无疑是幸运的。

《南京教育史》(第1版)于20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我曾以为自己对“南京教育史”的“书写”也已走进历史,未料,我的“实践书写”竟然延续至今,也就使我有对第1版《南京教育史》进行修订的机会。尽管“书写”的使命颇让我殚精竭虑,却也令我心生宽慰——毕竟,这样的人生体验非常难得,弥足珍惜。

南京的教育历史极其厚重,要把上下2000多年的教育风云浓缩于一部书中,实非易事。在重新审订书稿的过程中,我常常发出喟叹和感慨。喟叹的是,有些史料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翻检淘漉,也未必能有所发现,什么原因使它们渐渐沉入了历史的深处,不复为后人所记忆?感慨的是,又有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重量的历史人物、重要的文明成果,犹如黑夜里的星辰、草原上的大树,由不得你的好恶,兀自散发光亮、傲然挺立,什么原因使它们彪炳史册,让后人凝目正视?由此又想到,我们已经、正在以及将要做的事情,哪些可能只是流星划过,哪些又将传之久远、成为历史大幕上夺目的风景呢?如果“书写者”能够更多一些“历史意识”,更多一份历史使命感、历史方位感,“历史”会不会更少一些遗憾、更多一些精彩呢?

“新世纪以来的南京教育”，是本次修订中新调整增加的内容，既体现了修史之初确定的“写到当下”的原则，也是本人对这一段教育实践的“敝帚自珍”。21 世纪的头十年，我是南京教育改革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些深深浅浅的足迹，那些曾经的成功或者挫折、荣光或者沮丧，都令我感慨无限。回望这十年南京教育的历程，我可以无愧地说，所有的重大事件，我们都在现场；所有的重大变革，我们都没有缺位；所有的重大进步，我们都付出了智慧和汗水。因此，本次修订《南京教育史》，我们特意留出一些篇幅呈现这十年南京教育发展的风貌，以此向那些与我一起奋斗的同事同仁、向全市广大教育工作者致谢和致敬。

一个人的精力和生命是有限的，“南京教育史”的接力“书写”总要交棒于后人。在《南京教育史》（第2版）即将刊行之际，我想借一副对联表明心迹：“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在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录自话剧《立秋》）。同时，我也寄望接力“书写”者能够时时意识到，今天的实践其实就是在“书写”历史。如果按照每五年修订一次《南京教育史》的计划，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很快就会面临“史册”的取舍。究竟是成为历史的“主角”抑或成为历史的“过客”，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今天的把握和努力。我希望正在用实践“写史”的人们越“写”越精彩，并能够经得住光阴的洗涤、人民的评判和良心的叩问。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何为“明”何为“智”？我认为“明”当“明”在看清历史发展的脉络，“智”当“智”在画好自身的历史轨迹。希望这部新版《南京教育史》能够对读者尤其是教育工作者有所裨益，真正发挥开“明”启“智”之功。

2012 年 5 月